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四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廿四日出版



治

，外埠郵費另加。

★

，掛號四千，航掛一萬。

大家都有個可能

美國大選前奏曲

杜魯門：他是目前已知道的民主黨唯一候選人。他在計算着票數，可是他被華萊士嚇慌了。

(下)共和黨「中間派」的杜威(右)與自命爲
塔森(左)



華萊士：美國民主派領袖華萊士，最近宣布以第三黨的獨立地位，參加今年的總統競選。這一個空中霹靂，震動着美國政壇。



(左)共和黨極右翼的塔虎脫(左、與史塔森合影。

象與驢子都不是選民的眞正朋友



艾森豪威爾

共和黨的最後一張王牌

擁護艾帥競選總統的，最近大爲增加了。艾帥本人尙無明確表示。但是他如果出來競選，麥克阿瑟、塔虎脫等人，都非敵手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四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所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零售　每冊法幣一萬元

預定　三月共　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三萬五千元
十二期計　航平：十五萬元
航掛：十九萬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陣營，不是兩個
兩個世界。這一

起了相當的激辯，例如衆院撥款委員會主席泰勒指
摘「馬歇爾犯有提出令人驚奇建議之罪，不配担任

的情緒。印荷停戰協定的成立，並未終結印尼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甘地的絕食，也不能緩和印度動亂的局勢。因爲印度的人民都已明白，今天流血動亂的悲劇，正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和它們上層統治份子妥協政策的結果。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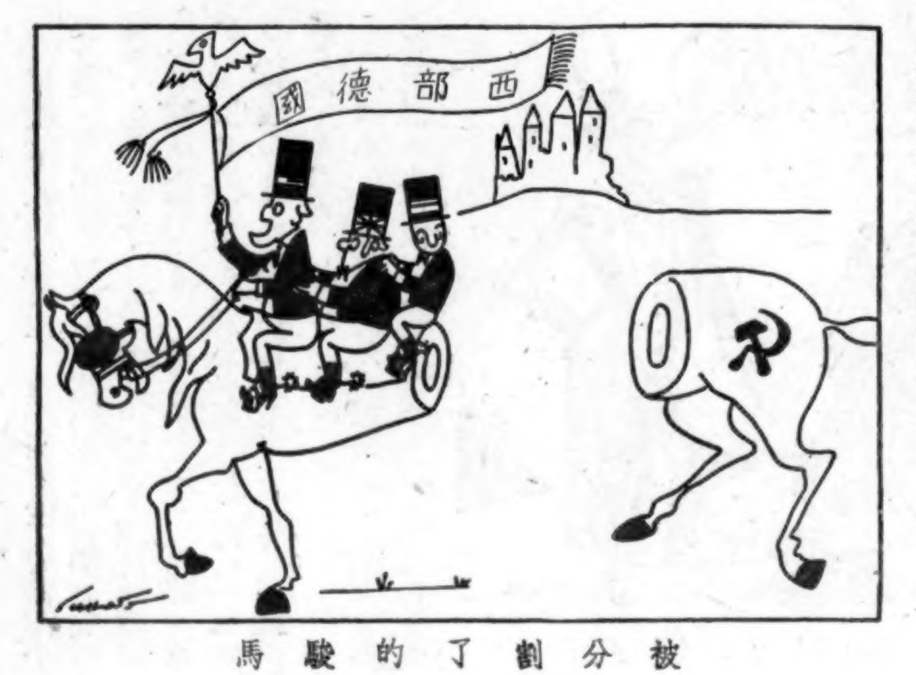
艾倫（James Allen）說：「美國今天的政策

營，不是兩個兩個世界。這一縱的，而且是橫世界本身也已分

與膨脹

出了長達三萬五會制定嚴峻的反捲入嚴重的不景要點：（一）透百十億元，較上額請議會批准包的特權的反通貨膨上平均每年上漲七年的盈利總額。他承認美國通其黃金美元和借，乃是實施馬歇爾已經完結，財富愈的薪給階級日益蒙物價來制止通貨膨加預算。這次杜魯六千八百九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三元，比現年度多二十億元。他堅持增加預算是不能免的，因爲「祇有這樣，美國纔能担當國內通貨膨脹和跟國外極權政治進行冷仗的重担。」

這樣，杜魯門把反通貨膨脹方案與馬歇爾計劃緊連在一起，彷彿作一把刀的兩面。這在議會中引起了相當的激辯，例如衆院撥欵委員會主席泰勒指摘「馬歇爾犯有提出令人驚奇建議之罪，不配担任國務卿」。又如代表兩黨最反動的右翼的塔虎脫和皮特（Byrd）早就在一再說杜魯門要造成「警察的國家」。原來，塔虎脫等也像大部份共和黨領袖一樣，贊成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原則，却不喜歡讓大企業來負担。他們不願意任何措施有絲毫觸及托辣斯自由的地方。塔虎脫等贊成馬歇爾的計劃，却在物價管制問題上與政府持異見，這固然反映了美國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反映了選擧年中兩黨政治的皮球作用。但基本上，塔虎脫與杜魯門的距離，頂多不過是幾十億元的錢而已。



被分割了的駿馬

美國大





艾森豪威爾
共和黨的最後一張王牌

…加了。艾帥本人尚無明確表…問題、塔虎脫等人，都非敵手



與史塔森合影。

象與驢子都不是選民的真正朋友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四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所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零售　每冊法幣一萬元

預定　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三萬五千元
航平：十五萬元
航掛：十九萬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廣告價

地位	底外(雙色)	封底裏	正文前後
全面	三百六十萬元	三百二十萬元	二百八十萬元
半面	一百九十萬元	一百七十萬元	一百五十萬元

已造成了兩個陣營，不是兩個集團，也不是兩個世界。這一

起了相當的激辯，例如衆院積欵委員會主席泰勒指摘「馬歇爾犯有提出令人驚奇建議之罪，不配担任

瞭望臺

縱橫的分裂

世界分裂了。這一週來國際政治的發展，正表現着分裂的更趨明朗化，鬥爭的更趨尖銳化。在歐洲，不但東西的鴻溝愈益加深，就是在西歐諸國，也展開着「援助」與反奴役的鬥爭。英法義的統治者已決心跟着美國走，這就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鬥爭是在展開中。在華盛頓，新近復會的八十屆國會，正在反覆討論着馬歇爾計劃。這反覆的討論，明白地揭露了馬歇爾計劃政治的和戰略的性質，以及美國經濟危機日趨嚴重的眞相。在另一方面，作爲「選舉年」重要節目的第三黨運動的興起，說明了美國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和反對戰爭政策的民主勢力的開始抬頭。在美國的擴張政策之下，西方國家對德日的單獨媾和是被考慮着；美英在世界各處的戰略基地是正在佈置着。在東方，日本在公然活躍中；中國的局面起着劃期的變化。九龍慘案所激起的波瀾，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情緒。印荷停戰協定的成立，並未終結印尼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甘地的絕食，也不能緩和印度動亂的局勢。因爲印度的人民都已明白，今天流血動亂的悲劇，正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和它們上層統治份子安協政策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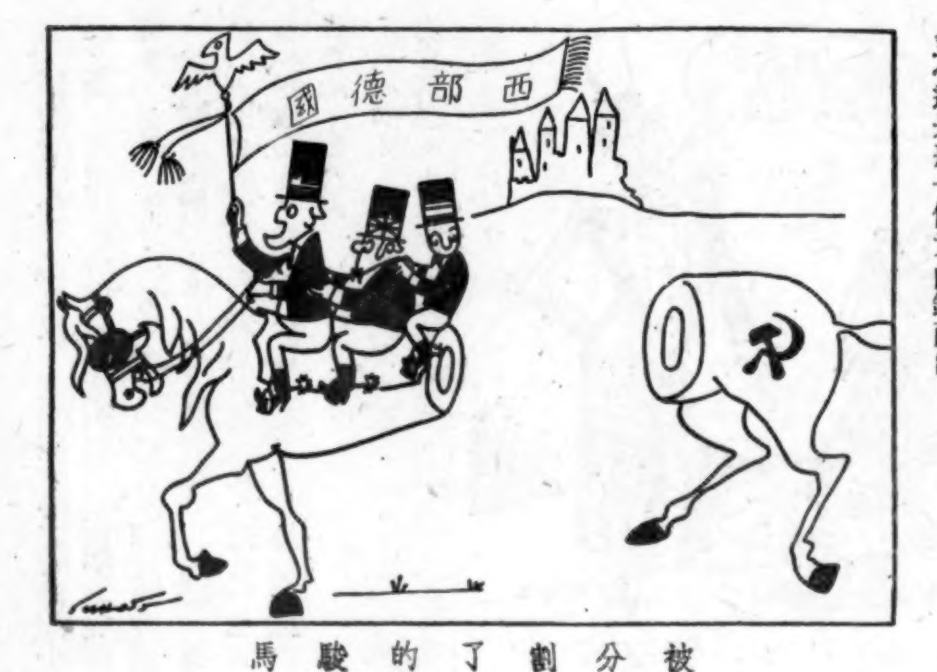
艾倫(James Allen)說：「美國今天的政策已造成了兩個陣營，不是兩個集團，也不是兩個世界。這一大分裂不但是縱的，而且是橫的。資本主義世界本身也已分裂爲二了。」

擴張與膨脹

十四日，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出了長達三萬五千言的經濟報告書，警告「除非議會制定嚴峻的反通貨膨脹法律，否則美國必定會被捲入嚴重的不景氣的漩渦。」這報告書包括了三個要點：(一)透露一九四七年度美國的出超總共一百十億元，較上年出超還增加三十億元；(二)再籲請議會批准包括管制工資物價和實施定量配給的特權的反通貨膨脹法；(三)指出工資的增加趕不上平均每年上漲百分之二十的批發價格，而一九四七年的盈利總額卻比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他承認美國通貨膨脹的結果之一，就是外國耗盡其黃金美元和借貸而得的資金；又指出這些因素，乃是實施馬歇爾計劃的重要理由之一。

這就是說，美國的戰時繁榮已經完結，財富愈益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裏，大多數的薪給階級日益蒙受其害。杜魯門要求部份的管制物價來制止通貨膨脹，要求提高公司的所得稅來增加預算。這次杜魯門提出預算總數爲三百九十六億六千八百九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三元，比現年度多二十億元。他堅持增加預算是不能免的，因爲「祇有這樣，美國纔能担當國內通貨膨脹和跟國外極權政治進行冷仗的重扭。」

這樣，杜魯門把反通貨膨脹方案與馬歇爾計劃緊連在一起，彷彿作一把刀的兩面。這在議會中引起了相當的激辯，例如衆院撥款委員會主席泰勒指摘「馬歇爾犯有提出令人驚奇建議之罪，不配担任國務卿」。又如代表兩黨最反動的右翼的塔虎脫和皮特(Byrd)早就在一再說杜魯門要造成「警察的國家」。原來，塔虎脫等也像大部份共和黨領袖一樣，贊成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原則，卻不喜歡讓大企業來負担。他們不願意任何措施有絲毫觸及托辣斯自由的地方。塔虎脫等贊成馬歇爾的計劃，卻在物價管制問題上與政府持異見，這固然反映了美國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反映了選舉年中兩黨政治的皮球作用。但基本上，塔虎脫與杜魯門的距離，頂多不過是幾十億元的錢而已。



被分割了的駿馬

馬歇爾計劃乃杜魯門主義的延長，它是一種對外擴張的計劃。事實上，它是無法與有效的反通貨膨脹計劃聯繫在一起的。杜魯門的十項計劃，並非如塔虎脫所說，乃「經濟自由的終結」。相反的，這個方案並未提供了限制大企業「經濟自由」的有效方法。通貨膨脹並不能靠管制幾種物價來阻止，這只有促使未受管制的物價上漲，而造成貨物的缺少。

而且，如其就美國今天對外政策的性質和方向看，杜魯門的阻止通貨膨脹計劃主要已不復具有名符其實的意義。誠如艾倫所說：「它有着一層更重要的意義，即在業已進行的軍事和工業動員之外，組織一個戰爭的經濟。」

細看美國議會中的爭論是有趣的，因爲這參衆兩院中的幾場爭論越來越明白地揭露了馬歇爾計劃的本質。例如農業部長安德遜說：「今後的出口物將側重國內豐裕的貨物而不着重國內稀少的物品。」這叫做「己所不欲，施之於人」；又如國防部長福萊斯特心直口快地說：「他知道馬歇爾未忘由美國以經濟援助與歐洲國家交換軍事基地的可能性，」害得馬歇爾立刻表示反對，這叫做「欲蓋彌彰」；又如范登堡表示：「美國民衆如果能獲得保證，由受援國家經常把使用美援資金的情形，報告給美國，那麼美人對於援歐復興方案的反對，將可以消減一半。」這叫做：「主權，予所欲也。」

總而言之：通貨膨脹（inflation），擴張（expansion）和「混賬」（Confusion）正是構成今天美國政策的三個要素。

華萊士的呼聲

美國的擴張政策，不但在國外招致了反抗，就是在國內，也已引起了分裂。

前副總統華萊士已決定組織第三黨，參加總統競選了。十七日，他在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第二屆年會中演說，指責「杜魯門主義和妄用歐洲復興方案名義的馬歇爾計劃，是大企業爲本身利益而控制的戰爭政策，」他又指出：「目前脫韁的物價漲勢，都是政府大企業的欺詐，以及華爾街的獲取暴利所引起。……杜魯門總統所提創的戰爭政策，將不能避免地引起更高的物價和更鉅的暴利。」這幾句話，確乎很打動了美國人民痛苦的心。據劉尊棋君美國通訊（見本期）所報道，華萊士所領導的第三黨運動，已日益獲得愛好和平的美國人民的擁護。

第三黨運動是否能獲成功，固然還無法斷言。但它的興起，却含有着重大的意義。一方面，這表示了美國資產階級的危機已促成了內部的分裂，以致像華萊士這樣比較開明的政治家也不能爲現行統治集團所容忍；另一方面，這表示華爾街控制下的危險政策，已喚起了美國人民的覺醒，而都集結在華萊士的旗幟下，爲爭取民主和平而奮鬥。

艾德禮何處去？

單獨媾和的計畫和馬歇爾計畫是一把刀的兩面，它正被用以斬斷所有戰時盟國的「情絲」。美國跨刀，英國幫忙，這在倫敦外長會議失敗以來，是尤其明顯了。一月三日艾德禮的演說，二十一日貝文的演說，都毫無隱諱地表示英國已決心追隨美國。二十日，在柏林盟國管制委員會中，美代表克來報告了法蘭克福協定的要點，英代表羅勃遜緊接着作了補充。據法國外交部發言人稱，英美法三國還將於下星期在倫敦舉行會談，討論西德行政組織問題。

緊接着英蘇貿易協定，使英國獲得了切需的小麥之後，艾德禮政府就立即斷然表示了仇蘇親美的態度，這已引起了工黨羣衆和進步工黨議員的不滿。如帕拉茨米爾（John Platts-Mills）批評艾德禮一月三日演詞說：「對於英國人民，這是一個宜言：要取得和平與進行社會的改革，首先必須撤換現行的工黨政府。」

事實上，工黨政府的外交經濟政策，和保守黨的政策基本上已無區別。大家都知道保守黨份子是貝文外交熱烈的支持者。克里浦斯的經濟政策也獲得獨佔資本的英國工業聯合會的嘉許，而且爲了討好大企業，鋼鐵國有化計畫也已加以展延了。

這種政策的代價是明白的，即從屬於美國政治和經濟的統治。工黨政府把一切希望寄托於美援，認爲只有靠了它，纔能苟延維持英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工黨的右翼領導者，已根本不想採取社會主義的方法來挽救危機了。乞求或反對馬歇爾計畫的選擇，在今天英國已展開了最迫切的鬥爭。



飢餓的衰獅

但就是在英國統治階級的內部，對於馬歇爾計畫的意見也有着分歧。例如皮佛勃洛克（Beaverbrook），他竭力主張英國必須自己雙足站起來，而反對馬歇爾的援助。他所辦的「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認爲英國沒有馬歇爾計畫的援助就不能生存乃是胡說。它指出一億二千三百鎊的烟草，「我們可以取之於帝國」；三億鎊的油，「可以取之於英鎊的區域」………

皮佛勃洛克的見解，說明了英國資本家在倚賴美援問題上的分裂。皮佛勃洛克爲什麼如此主張？那主要原因是在於他保持帝國，使其不受美國控制的願望，猶如當年邱吉爾力主反納粹，是同一的立場。說也有趣，一個自名爲社會主義者的艾德禮，主張死心倚賴資本主義的美國，而一個保守黨的資本主義者卻反而表示反對，這也許是英國政治的特點吧。

此外，前燃料部長現任國防部長辛威爾(Emanuel Shinwell）最近表示：「工黨不但必須保持對蘇的友誼，而且必須把情感轉化爲現實。」倫敦方面最近曾盛傳與辛威爾有關的工黨政府即將分裂的謠言。

日本的秘密計劃

當盟國對日和約的問題在分歧的意見中僵持，而美國躍躍欲試地陰謀單獨對日媾和的時候，狡黠的日本人卻正企圖利用這盟國分歧的機會，來贏得有利於日本的和約。

據「世界報告」（World Report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所載，該刊駐東京記者弗洛姆（Joseph Fromm），最近曾獲得東京外務省所起草的一個祕密文件，透露了日本準備在和會中運用的策略。她企圖從美蘇對立的運用中，來取得最溫和的條件。

據該文件所示，日本外交家企圖求取「談判」的和平，而不以東京無條件投降爲基礎。他們要廢棄麥克阿瑟所發的一切指令，要取消盟國對日本內政的監督，要自由發展貿易和生產，要廢除工廠賠償的規定，要擴充商船、航空和武裝的警察。此外，在領土問題上，日本將盡量與盟國討價還價。特別對於南庫頁島問題，日本將對蘇採强硬態度，他們相信可以獲得美國的支持。

計劃中又暗示日本將爲美國的聯盟，他們願意與美國單獨締和而排斥蘇聯。他們認爲美國佔領軍撤退後，日本將處於對蘇的重要戰略地位，這樣就可以運用姿態，來迫使美國作更大的讓步云云。

好一個挑撥離間，陰險兇狠的毒謀！

印度的動亂

甘地又絕食了一百二十小時，據報載，印度與巴基斯坦政府已成了「休戰協定」，印回的流血暴動暫時告了段落。甘地的絕食終止了印回的流血。印回的「休戰協定」救了甘地的命，因爲否則甘地是要絕食而死的。

但是甘地的「精神感召」眞能解決印度的動亂嗎？不可能這樣的簡單。原來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雖說已成爲獨立的國家，實際上仍受英帝國主義的控制，這是一；還有印回兩國的政權都分別握在不民主的印回領導者的手裏，他們都各自倚賴宗教社團的力量以互相對抗，這是二。這是印回不斷流血暴動的根源。根源不除，印度的動亂難望從此平靜。

所以，印度的前途，也有賴於印度人民反帝民主鬥爭的成功。

九龍事件

在多難的中國，九龍慘案是一個悲劇的插曲。九龍英軍武裝强拆民房，並槍傷中國人，結果引起了全國公憤，各地遊行示威。十六日，憤怒的羣衆燒燬了廣州沙面的英國領事館。

英國方面除由施諦文大使口頭抗議外，二十一日又以書面照會向外部提出，要求賠償和補救。據王外長在政務會議中報告，九龍事件正謀解決中，雙方都不願事情擴大。看樣子，大概就可告一段落了。

沙面事件也許是不幸的。但這是果，不是因。從全國人民一致抗議的情形看來，中國人民今天有着如何悲憤的心情。悲憤是會激成力量的。九龍事件乃其小焉者耳。

一，廿一。



難產的新社會國際

孫思定

一

英國首相艾德禮於一月三日在官邸向工黨發表了他的第四次政治演說。他說：

「今天我們不列顛人民，經由工黨政府，正給予世界以切實的領導。今天正需要這種的領導，以維護我們所繼承的歐洲文明。這一種的領導，決不是保守黨或自由黨的政府所能夠給予的。今天的共產黨在東歐雖然推翻了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專橫與殘暴，然已否認個人自由及政治民主的賜與，以及西歐的傳統精神。蘇聯的歷史，可以給予我們以警告，就是倘使沒有政治的自由，集體制度即不免進入歧途，引起新形式的壓制及公理的剝奪。蘇維埃共產主義主張的政策，帶有新帝國主義的威脅，用思想的、經濟的和軍略的帝國主義，威脅歐洲他國的福利，以及生活方式。」

艾德禮接着講：

「在另一方面，有一個主張個人政治自由和維護人權的美國，但是她的經濟是拿資本主義做根據的。美國人民的財富，有顯著的不平等。英國也像西歐其他的國家，無論就地理上或經濟政治理論上講，是位於美蘇兩制度之間的。我們的任務在創立一個進取性的新制度，一個以個人自由、計劃經濟、民主主義和社會公理融會而成的制度。我國以及西歐各國所面臨的這一個任務，需要具有新社會觀念的政府，及適應新局勢需要的緊急政策；決不能由任何舊政黨，不論是法西斯或共產主義的極權黨所能完成的。工黨政府所執行的民主社會主義，意欲建立一個使每一個人都能獲得良好生活的條件，不受政府或其他方面的壓迫。工黨政府所給予的領導，不但為我國所需要，也是歐洲所需要的。」（路透倫敦三日電）

接着，法國社會黨耆老萊翁・勃倫也於一月七日建議由英法兩國領導「世界上第三方面的勢力」，以緩衝美蘇間之對立。勃氏說：這一個第三方面勢力，當能和美國的「資本主義、擴展和不人道」以及蘇聯共產式「帝國主義、消滅人權」的兩種勢力作戰。勃倫曾在戰前戰後幾次任法國總理，他的言論發表在社會黨喉舌的「人民報」上。他並且建議第三方面勢力，可以替代聯合國促進美蘇間的和好。勃倫說：「聯合國聽任美蘇衝突，以至陷於半身不遂的境況。」（合衆巴黎七日電）

這呼聲發出以後不久，國際社會黨會議委員會便於一月十日在倫敦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加強歐洲各國社會黨之國際組織計劃」。結果，會中成立了決議：「定於六月四日到六日在維也納召開社會黨國際大會全體會，設小組會以監督社會黨情報和聯絡局的財政和行政，由英、荷、比、奧、捷等國代表組成。」（路透倫敦十日電）

同時，「英國內閣高級官員十二日證實，參加馬歇爾計劃的西歐各國社會黨，將在倫敦召開特別會議。英法在數日內即將邀請各國代表參加會議，討論在馬歇爾計劃規模下的歐洲合作問題。」但指出，「社會黨會議和歐洲合作委員會有別；合作委員會為正式馬歇爾計劃委員會，參加者有十六國，最近也準備召開會議。」（合衆倫敦十二日電）

究竟一回事，還是兩回事呢？社會黨國際大會，西歐十六國（參加馬歇爾計劃者）社會黨特別會議，與歐洲合作委員會似乎是三樁事情，又似乎是一件事：究竟其間有什麼關聯呢？

二

歐洲各國社會黨為討論復興社會主義國際，曾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倫敦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但並無什麼決定。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倫敦召開第二次會議時，才決定設立一個恢復社會主義國際的籌備委員會。可是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在英國近海的克拉克頓召開第三次會議，却又生了變卦。當時決定，不再恢復戰前社會黨的國際組織，而祇是樹立各社會黨之間的合作，僅設立一個社會黨情報聯絡局。到一九四六年八月在巴黎舉行第四次會議時，國際組織問題已不再提起。一九四六年於英國普恩茅斯舉行第五次大會時，各代表意見格外分歧，因此大會不得不承認，社會國際的恢復已經不可能而且不利的。到第六次大會在瑞士沮利克舉行時，這問題可提出了，但又擱起了。一直到現在。

為什麼從第三次大會起就變卦，而且總是提出，總又擱起呢？因為第一二次大會時，只有西歐與北歐各國的社會黨參加，而東南歐各國的社會黨却是從第三次大會時才開始參加的。也正在這次大會上，開始提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參加的問題。英國與比利時、荷蘭、奧地利、以及斯堪迭那維亞各國社會黨代表堅決主張必須把蘇馬赫領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包括在預期的社會主義國際之內，而東歐各國社會黨代表却極力反對；他們甚至質問：「英國是否企圖利用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反蘇的武器？」第五次大會中所以鬧得意見分歧也還是為了這個問題。到第六次大會時，雖以十票對五票的多數否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申請，但還是決定設立一個「聯絡委員會」，以援助「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努力」。對於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的申請却抱着另一個態度；決定在允其申請之前，先派一個「調查委員會」到保加利亞去。

英國工黨對外政策部負責人希雷（Denis Healey）曾說：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際是不可能也不需要，因各國社會黨缺

之「利益的共同性與一致性」。其中許多業已執政或準備執政的社會黨，要對自己國家的政策負責，因此也不可能受任何國際機構的決議支配。而且英國工黨與諸大國的社會黨也不能同意遵守一個以各會員平等基礎的國際的決議，因爲那裏的大多數是由弱小國家的社會黨組成的。另一方面，歐洲的許多社會黨決不肯順從一個國際，如果這個國際的領導權無可避免地操縱在西歐社會黨的手裏。

希雷所指的「弱小國家」其實便是東南歐各國，而所謂領導權落在「西歐社會黨手裏」，其實便是指英國。換言之，有東南歐各國社會黨參加的國際組織的決議，英國是「不能同意遵守」的，而由英國工黨「操縱」的領導權又未必能使東南歐「順從」；因爲缺乏「利益的共同性與一致性」。這樣，社會國際的組織問題便屢提屢擱了。

三

可是社會國際既屢經擱置，現在爲什麼還是要提呢？

在第六次大會之前，勃倫曾經在人民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於社會主義國際的任務與作用，發表了意見。他寫道：

「我現在想對我的社會黨同志們，尤其是歐洲的大黨們談一談。我要重新對他們指出，決定我們的立場（它可以成爲國際社會主義的立場）之迫切和需要。如果我們歐洲的社會黨對於新的美國租借法、歐洲合衆國、歐洲聯邦、歐洲經濟集團等問題，在報紙上，在演說中，或政府內，採取着不同的立場，那是多麼可悲的事。」

那麼，什麼是社會主義立場呢？他說：

「要領導一個大規模的社會輿論的運動，這個運動將鼓勵美國的主動，而不去阻擋它。」

去年，小考茨基（卡爾・考茨基的兒子）在五月十六日起的幾期 "Volksrecht" 上連續發表了一篇題名「我們是否需要新的國際？」的長文。他把這個國際假想爲一個對付蘇聯和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中心，組織和支持工人運動的分裂工作的中心。他比勃倫的論調更露骨了。

可是這個「立場」的提出却使歐洲各國社會黨的意見更見分歧了。捷克社會民主黨的勞斯門早就在「新自由報」上指出：

「某些社會主義者正在盡其所能設法恢復第二國際。他們祇是在救活一個殭屍，而他們自己却是社會主義國際的掘墳者。無論如何，必須認明，團結是從行動中產生而不是從會議中產生的，而人民對團結早已有了相當的進展了。」

另一個捷克社會黨人海約克曾寫道：

「把反蘇傾向工黨的路線聯合起來的願望祇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敵人……眞正的社會主義者是反對這種路線和不願意第二國際的傳統復活的。」

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人黨的「人民報」指出他們所需要的怎樣一個國際時說：

「這樣的一個國際才足以代表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才符合爭取和平的鬥爭，擁護社會主義而反對法西斯主義與反動份子的鬥爭，而不是爲帝國主義集團鬥爭；因爲如若爲後者而鬥爭時，它就是反動資本家的利益的盾牌，或者分化全世界工人階級隊伍的形式。」

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的「解放報」更明白指出：

「鑒於過去的錯誤，我們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和多腦河諸國的社會黨（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波蘭）對恢復社會國際一事發生了我們的意見：在今日祇可能有一個國際，那就是一個包括全部工人政黨—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國際。」

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副書記長賈吉更直率指摘法國社會黨的領袖說：

「歐洲的社會主義工人，憤慨地注視着今日法國的領袖。那些參與通過以反對有組織的勞工爲目的的法令的人，都不是優秀的社會主義者。今天帝國主義者正在進行生死的鬥爭，以便讓美國獨佔資本家獨霸歐洲市場。我們知道，美國大洋的錢也站在社會主義的叛徒、薩拉迦脫，柏特拉斯克和彼羅的背後。我們反對他們的政策，因爲我們想把歐洲的勞工階級從不幸中挽救出來。那些庇護帝國主義者，並且剝奪工人罷工權利的人們，一定是法西斯主義者。廁身法國政府中並且以部長的身份參與通過奴役法令的社會黨人敗壞了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的名譽。」

所以在一月十日舉行的國際社會黨會議委員會中便形成了兩派的主張：「一派係法國及比利時兩國之社會黨所主張，建立實際國際社會組織，以與共產國際情報局之活動相抗衡；另一派爲匈牙利及波蘭社會黨所主張，倡保持國際社會黨會議之互相諮商地位。」（中央倫敦八日電）

四

就在兩種相反的意見的抗衡中，社會國際便難產了。這兩種意見顯然以馬歇爾援歐計劃爲分界綫的。所以一面既決定於六月四日到六日在維也納召開社會黨國際大會全體會議，一面却又由英法出面邀請參加馬歇爾歐洲復興方案各國的社會黨，包括德奧社會黨代表到倫敦舉行特別會議。「觀察家」—很爲重視，認該項晤談和英國政府的對歐政策和國際社會黨的未來合作有重大關係。」（路透倫敦十日電）這引證的艾德禮一月三日的演說與勃倫七日的建議似乎可以覘其動向。

可是縱使撇開了東南歐的各國社會黨而以西歐十六國的社會黨（或工黨）來建立一個「與共產國際情報局之活動相抗衡」的社會國際是否可能呢？

以十六國而論，當然英國工黨與法義兩國社會黨是主要支柱。可是義大利的社會黨就是不能和艾德禮與勃倫合作的。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義大利社會黨在佛羅倫斯舉行大會時，該黨領袖南尼便指出「西歐社會黨某些領袖們想在國際的假面具之下組織一種西方集團的企圖」。即英國工黨與法國社會黨本身也有着分裂的現象。英國工黨的「叛黨分子」雖經艾德禮與貝文用黨紀硬鎮壓着，但他們的人數與活動却有增無減。法國社會黨的左派已正式分裂，另組了「民主統一的社會運動」。

所以，假使艾德禮與勃倫一定要依照他們的意圖組織一個新的社會國際的話，它的實質上的範圍將比歷次舉行的社會黨國際大會大大地縮小了。它是否能具有充分的力量達成勃倫所標揭的「任務」，發揮勃倫所指出的「作用」呢？這是值得研究的。

本刊紐約航訊

美國第三黨運動

劉尊棋

華萊士——一個象徵

「為什麼不勇敢地站起來呵，挺直身子，做一個人？」

十二月廿九日深夜十一時半，華萊士在無綫電裏這樣號召着美國全體人民。

紐約正埋在六十年來未有的大雪下面。美國人民的心情，受着空前未有的物價威脅、戰爭煽動和法西斯恐怖的壓迫，也就像壓在二十六吋大雪下的紐約一樣，輾轉呻吟，喘不過氣來。千百萬的耳朵聽到華萊士的粗壯的聲音，知道他已決定競選一九四八年的總統，無不熱烈歡呼，奔相走告。

當華萊士宣佈他這個重大決定的前兩星期，美國進步公民協會（PCA）聲明決議建立第三黨，邀請華萊士競選的時候，許多人們還不能斷定華萊士究竟肯不肯這樣做。這位前任民主黨副總統從來不曾表示他要以第三黨領袖資格競選。他幾乎每次都說：我們要看民主黨倒底會不會改邪歸正；除非必要，我們不組第三黨。現在顯然已經到了「必要」的時候了！

倘如華萊士到這時候還沒有如此堅決的表示，廣大的美國民衆該會多麼失望，簡直是無法想像。一年來反動的共和黨議會把美國人民逐趕到了戰爭的邊緣。從議員口中，從白宮，從報紙雜誌和所有無綫電廣播中，戰爭的喊叫就像火舌一般時時不斷地向人民面前衝來。本月間議會重開後與「援歐計劃」同樣列為優先討論的，就是「普遍軍訓案」——一千多萬的壯丁被迫受全年的軍訓。在這一切戰爭喊叫和戰爭措施的下面，掩蓋着通貨膨脹的嚴重威脅，和人民權利的備受摧殘。僅僅十二個月裏面，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塔虎脫·赫特萊勞工法、公務員忠誠考查、國會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審訊、九十個人民團體被列入黑名單、物價高漲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這一連串的鞭笞，打在人民的身上，使他們不能不怒吼起來了。

「我們要華萊士！」這是我幾次聽到美國民衆同聲喊出的聲音。最使我不能忘記的一次，是去年九月十一日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在紐約麥迪生大會堂舉行的講演會。那一天正是華萊士發表反對美國外交政策演說的一週年紀念。在好幾個人演說完畢之後，他走上了講壇。兩萬五千個聽衆像一陣雷鳴一樣鼓掌歡呼：「我們要華萊士！」

「我決不輕易讓步！」這個五十八歲的青年張口了。「今天我說，如果民主黨是一個戰爭的黨，如果我的黨繼續摧殘民權，如果兩黨都支持高物價和經濟蕭條的政策，那麼，人民必須有一個自由與和平的新黨。人民必須有一個選擇！」

當華萊士這樣講的時候，我看一看左右和背後座位上的人——婦女和所謂白領工人佔多數——臉上橫溢着天眞而興奮的笑顏。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工人眼眸上浮現一層熱淚。他窺見了他的希望。我窺見了美國的希望。

獨佔資本控制下的所有報紙無綫電，隨着華萊士聲譽的提高，加緊對他攻擊誣衊。他們的詞鋒是如此之刻毒，態度是如此之卑劣，我甚至躭心他們遲早有一天把他殺掉。

但是一個人如果知道了他的意志象徵着人民大衆的意志的時候，他是無所懼怕的。正如著名評論家S·格萊夫頓所說，華萊士已成為一個「不可毀滅的」人物了。格氏並且寫道：「事實上，如果沒有華萊士，我們也會發明一個華萊士。」雖然與華萊士同為「新政」中的閣僚，但在許多事情上反對他的前內務部長伊克斯，除了承認格萊夫頓的話外，這樣寫道：「我對於目前無可懷疑的廣泛的擁護華萊士先生的熱情，是這樣分析：人民正在追求領導」

在「新共和」的主筆辦公室裏，陳列着華萊士從全國和世界各地寄給他的信。隨意瞥視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句子：

「請你饒恕我說這些沒有意義的話，但我在這可怕的反動的海洋中實在感到

孤獨，深怕它一天天會把我們大家都吞沒下去。……」

「你和全世界其他的進步的人們堅持了一件活生生的事實，就是人民還有朋友爲他們說話，爲他們戰鬥，也爲他們受過……」

「華萊士先生，請你注意這個請求——不管你在下一屆選舉中對政黨問題如何決定，那是無關宏旨的。重要的是——給我們機會投你一票！」

有一本簽名册是華萊士從歐洲回來後，「法國抗戰婦女會」寄給他的，上面寫道：「我們把不顧和任何人分享的東西獻給華萊士！」

反動的海洋

在今天的美國建立一個爲「和平、安全與繁榮」而鬥爭的統一戰綫，是比荷蘭建築防海的堤壩還不知艱鉅若干倍的工程。只要想像一件事：在全國五千多家報紙中刊登廣告的大報有一、五六二家，其中沒有一家不是攻擊華萊士和第三黨運動的。全國性的廣播電台有廿二家，也沒有一家是爲華萊士說話的。替華萊士廣播十二月廿九日演講的WOR，過了幾小時後就廣播它的評論員攻擊的言論。

「最有權威的」紐約時報在華萊士聲明競選後一星期，在第一版用大標題指控華萊士是一九四七年糧食投機者之一。紐約先鋒論壇報社論說他是「張伯倫第二」，主張對蘇聯實行「慕尼黑的綏靖政策」。

一般報紙的戰略特點是：盡可能抹殺華萊士與新黨運動的消息；譏諷他的舉動，說他是一個「唐吉訶德」，誇張「勞工領袖」與「自由主義」論客對他的攻擊；強調民主黨必敗的徵象以證明新黨運動只能幫助共和黨的成功。

在無綫電中，隨便你把指針擺在那裏，隨時你可以聽到「新聞評論家」們的吼叫。他們的題目可能是「華萊士與莫洛托夫」，可能是「一九四八年展望」，但必然要把華萊士痛罵一頓。你雖然只能聽到聲音，但你不難想像那廣播的人是在怎樣橫眉豎目，怒髮衝冠，你也不難想像他腦海中正在安全地考慮着，經過這番痛罵後他這一年的廣播合同便保證不會取銷。

一切反動新聞言論工具的總動員的目標有二：把華萊士形容爲一個共產黨的傀儡；在同情華萊士的人們心中造成失敗主義的情緒。

對於這兩大目標，美國若干所謂「自由主義者」貢獻的力量比誰都來得起勁。最顯著的是美國進步公民協會領導人之一佛蘭克·金頓，該會紐約三十分會主席雷蒙·瓦爾施，和紐約下午報的一羣論客如麥克斯·勒納爾（Max Lerner）等。

進步公民協會全國委員會開會決議邀請華萊士以第三黨候選人資格競選總統時，金頓單獨反對，提出辭職。瓦爾施第二天相繼辭職。金頓是該會創始人之一，年來以該會副主席資格大聲疾呼，攻擊民主共和兩黨，但到了人民的力量表現在具體的行動時，他畏縮了。他立刻掉轉了槍口，集中火力攻擊華萊士和第三黨運動。他現在是最出風頭的一個人。在紐約郵報上每天寫着專欄，並且當一個個進步的無綫電評論員都被解聘之後，獨獨他還能保持那個飯碗。他正企圖競選紐哲西州的參議員。第三黨成立後，他當然是舉大旗的一個人，於是他就不能再和上層的紳士們討價還價，而專欄和廣播的差事也就保不住了。一般人認爲這是金頓退出鬥爭陣營的主要原因。同時金頓的動搖和投機傾向並不是從這次的行動開始。當去年九月聯合國大會開會，蘇聯外次維辛斯基發表演說，暴露美國鼓動戰爭政策時，其中曾引證過金頓的話。他害怕極了，第二天便在專欄中痛罵了一頓蘇聯，以表示他的「忠誠」。

紐約下午報的一羣紳士們，也是比誰都急忙地表明他們對新黨的反對態度。這些論客們，平常寫些「無傷大雅」的批評文章，到了重要關鍵便成爲反動集團最出力的戰將。他們不僅是怕他們的主子們把他們「歸類」，而且幻想以他們平時「進步」的資本，藉此機會大博主子們的歡心。

必須弄清楚，美國人沒有一個人不是自稱爲「自由主義者」的。從金頓到塔虎脫都是「自由主義者」。紐約州最反蘇反共的政治集團叫做自由黨。世界上一切少數派，無論是膚色、宗教、政治、民族的少數派，最受歧視的是在美國，但美國被稱爲最民主自由的國家。一切工商企業最受獨佔控制的是在美國，但共和黨爲了鞏固這種獨佔的控制所喊的口號叫做「擁護自由企業」。

美國在華萊士領導下的新黨運動是面對着這樣一種反動的顚倒是非的社會政治結構而展開的。這是一個「向山頭仰攻」（uphill fight）。擁護華萊士的人們沒有一張報紙，沒有一個電台；他們僅僅相信一個武器，就是今年十二月要塡寫的選舉票。

美國式的選舉

美國最大的誇耀，是用選票而不是用子彈改革它的政治(by ballots, not by bullets)。讓我們看一看怎樣用選票來改革。

簡單地說，美國四年一度的總統和國會的選舉，必須經過三個重要程序

：黨內的初選、全國黨代表大會、和人民投票。各州市雖有一些小黨，如紐約州勞工黨、共產黨、自由黨，其他各州的進步黨，但是在全國範圍內實際有競選資格的只是民主與共和兩黨。只有這兩黨在每州的選舉票上都列有它們的候選人名字，其它的黨只在各別的州方有列名。

這兩個大黨，和世界任何國家的黨都有一點不同，就是它們沒有黨員，只有職員。它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黨員，到了投票時，有多少人投民主黨的候選人，民主黨就可以稱自己有多少「票」，但不能稱有那麼多黨員，因爲那些人下一次也可投共和黨的票。因此，黨內初選，就是每一黨在每一州市的委員會發動參加全國大會代表的競選，誰肯來投票，誰投票。全國代表大會去爭取通過了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便可列名於十二月間的選票上了。從初選到全國大會，每一個步驟都由黨中的少數職員操縱着，而這些少數人員幾乎完全受命於大資本家。

因此之故，在美國選舉制度下，理論上儘管說人人有被選爲總統的可能，每人有權選舉他喜歡的人做總統。事實上無論是誰，如果不得兩黨之一的通過，決無當選的可能。同時，無論你喜歡誰，倘若他不是這兩黨之一的候選人你就沒有達到選他的目的。

這樣就造成了兩種現象。在過去，一個有進步主張的政治家倘若想參加政權，必須首先取得兩黨中「大亨」們的信任；在另一方面，人民儘管不滿意兩黨，如果不棄權，只得在「兩惡之中取其輕」(Lesser of the evils)。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八十屆議會的選舉，就充分表現了這種破產的「民主」癥結。人民對杜魯門和民主黨的政策失望憎恨之餘，又無法選舉他們理想的人物，便大量棄權。那一次投票的人數，只佔美國人口的五分之一。這五分之一的人大部分是僅僅爲了向民主黨抗議而選的共和黨。

不待指出，今天民主黨與共和黨無論在內政外交上，已然接近到完全相似的地步，使人民在這「兩惡之中」已無法判斷孰輕孰重了。倘如美國人民不起來從根本上改變這兩黨獨裁的制度，他們就永久沒有翻身的機會。

過去美國也不是沒有打破這兩黨制的企圖，但都因爲沒有發展爲工農與中小資產階級的聯合鬥爭終未成功。這些企圖中最顯著的，要算第一次大戰前夜的社會主義黨。在英勇的鐵路工人領袖尤金·戴布斯(Eugene V. Debs)領導之下，當時一切進步的既成團體，聯合組成了社會主義黨。戴布斯從監獄裏剛剛放出，出而競選，獲得九十餘萬票。到美國參加第一次歐戰時，戴布斯以反對參戰又被捕下獄。社會主義黨至今仍以湯瑪斯爲首，連續競選，但早已成了反動勢力的附庸。此外，美國中西部拉法萊特領導的進步黨在一九三二年也曾得到八十餘萬票。它原來是代表中西部新興資產階級和富農階級，反對東部獨佔資本勢力的壓迫而興起的，後來成爲孤立主義的堡壘，一天天失去人望。

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人們，藉口美國過去第三黨運動無往而不失敗，認爲今天新黨也決不能成功。他們更重要的指責，是今天的新黨運動分裂了進步勢力的陣容，使民主黨中許多還有希望當選的進步議員，失去當選的希望；並且說，這樣就幫助了共和黨的勝利，而與其讓共和黨完全勝利，還不如擁護民主黨，尤其是後者中間的「進步分子」。

新的人民陣綫

攻擊新黨運動的美國「自由主義者」根本上抹殺了今天的第三黨運動和過去歷次的第三黨有一個重大的不同處。

在過去，美國的獨佔資本勢力主要威脅的對象是在國內的工農和中小資本家。一個新黨的蹶起大都以直接保障受威脅階層的經濟利益爲動機。例如民主黨的興起，主要是代表中西部新興資產階級與南部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以對抗共和黨所代表的東部獨佔資本和重工業對他們的壓迫。從民主黨脫胎出來的進步黨，則是因爲民主黨當選以後不獨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而且背叛了它的擁護者的信任，一步步和獨佔資本妥協起來。但是無論是進步黨也好，社會主義黨也好，都只是局限在很少數地區和很小的階層，沒有抓住全國所有被壓迫者的要求，沒有發展爲廣大人民的聯合陣綫。

今天美國人民所面對的形勢，與過去迥然不同。首先，民主與共和兩黨都成爲毫無差別的獨佔資本的政黨，人民在這兩者之間完全沒有抉擇的餘地。而美國獨佔資本的性格也已大不同於過去。它正在瘋狂地進行獨霸世界的企圖。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拿出了二百廿七億五千萬元來收買各國反人民的政權，進行反民主的陰謀，建立美國的獨佔市場。目前國會所討論的馬歇爾計劃加上去年十二月已經議定撥給法義的貸款，又共達二百二十億元。

這些鉅額的貸款，並不是獨佔資本家從自己的荷包裏拿出來的。它是全國人民替獨佔資本家拿出來的。爲了達到獨佔資本家霸佔世界的目的，美國人民不能不在空前的高物價下生活。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最近發表，美國一

個四口之家(夫婦和兩個子女)每年最低必須用三千八百元，方能「過得去」。但是杜魯門在一月七日對國會致開幕詞中指出，「我們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每年平均收入爲八百五十元。」這就是說，經常有三千萬左右的人口幾乎在

除了下層工人外，支持第三黨的大衆是家庭主婦和自由職業者。進步公民協會中大半以上的會員都是後兩種人物。家庭主婦的每天感到柴米油鹽的困難，是參加反高物價的主力軍。她們對於戰爭危機也比較警覺，因爲那會

個四口之家（夫婦和兩個子女）每年最低必須用三千八百元，方能「過得去」。

但是杜魯門在一月七日對國會致開幕詞中指出，「我們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每年平均收入爲八百五十元。」這就是說，經常有三千萬左右的人口幾乎在飢寒交迫之中。而美國的六七千萬產業工人平均每星期工資，據勞工統計局局長克雷格的報告（紐約先鋒論壇報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爲五一·〇二元。據他說，這個數目較戰時最高峯還多出百分之七。但是美國的生活指數，在過去一年中增加了百分三〇以上，如與戰時相較，至少增加了百分之五〇。

相反的方面，美國大資本家的利潤却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峯。杜魯門自己在他的一月七日國會致詞中指出，公司的利潤（除去所得稅外）在一九四七年總共爲一百七十億元，而在一九四六年（打破紀錄的一年）則爲一百二十五億。這就等於美國公司總投資的百分之六〇以上。

獨佔資本把侵略海外的全部負担放在人民的身上，自己却坐享厚利。他們爲了保障他們的豐厚利潤，只有繼續維持高物價的政策。同時他們要保持國內高物價，便儘量推行馬歇爾計劃所代表的對外大量貸款與獨霸世界的政策。

美國人民如果跟着這種政策走下去，在目前要受到切身的物質苦痛，在未來還要担負戰爭的危險。因爲美國獨佔資本和它的政府正日夜準備着一場戰爭。這個政策正是把美國推上與全世界和平人民作戰的唯一路上去。

凡是不願意跟隨這種政策走的人們，不願意啼飢號寒和「死在俄羅斯的冰天雪地中」的美國人民，就被稱「共黨份子」。獲得了這個時髦頭銜的人，就失去了美國憲法上一切民權的保障。失業、破產、罰欵、坐牢都會跟着來到的。

廣大的美國人民已經逼到懸崖上了。當華萊士說：「讓他們叫我們是共產黨吧！」這句話正喊出了千千萬萬人心中的苦悶。

華萊士的競選和第三黨的出現對美國勞工是一大試鍊。美國工會貴族正和所謂「自由主義者」一樣，竭力阻止下層工人擁護華萊士。他們的一貫政治行動是追隨民主共和兩黨，作爲它們的附庸，在其中討價還價，拾取恩惠，以鞏固他們自己的地位。一旦工人擁護了一個堅決的政治路綫，他們就立刻失去控制，失去欺騙作用，失去對資本家討價還價的地位。當美國只有兩大黨的時候，他們自然容易操縱，但新的形勢出現後，一種廣大的下層統一戰綫是會擺脫工會貴族的控制而湧現出來的。產業團體大會（美國兩大工聯會之一）主席摩萊在一月八日「致各工會書」中，僅僅勸告各工會「暫勿表明態度」，而未正面禁止他們擁護華萊士，就是可證明下層工人的情緒了。

除了下層工人外，支持第三黨的大衆是家庭主婦和自由職業者。進步公民協會中大半以上的會員都是後兩種人物。家庭主婦的每天感到柴米油鹽的困難，是參加反高物價的主力軍。她們對於戰爭危機也比較警覺，因爲那會奪去她們的丈夫和兒子。進步公民協會在各地有里弄分會，十九都是婦女。我在幾次這樣的里弄分會開會時旁聽，發現婦女比男子態度堅決多了。

此外還有一股雄壯的力量，就是黑人。美國十個人中有一個黑人。他們大部分在南方各州，受最反動地方勢力壓迫，沒有選舉的自由。但是只要有機會，他們會使用他們唯一的武器——選票，來參加第三黨的。

當然，農民是不可侮的力量。美國農村人口在一九四六年每人平均收入爲七七九元。這個數字掩蓋了一個事實，就是千萬以上的南方貧佃農，每年每人收入不到二百元。在民主黨的反動勢力壓迫下，他們和黑人一樣，幾乎完全沒有選舉的機會。

但是所有這些被凌辱的人們——工人、農民、主婦、自由職業者，還有失望的青年退伍軍人——都是新的人民陣綫的潛在力量。他們得到了新的選擇，華萊士。這個陣綫的旗幟一天天明朗了，是一個「反對戰爭，要求和平，反對獨裁，要求民主，反對蕭條，要求繁榮」的人民陣綫。

華萊士在一九四八年大選中究竟有幾分成功的把握呢？只有武斷家纔能在這麼早的時候下一句斷語。但有幾樁事可以記住：

華萊士在一年來各處演講，共收到五十餘萬張入場劵。今天美國任何政治家，即使是杜魯門，賣不上這麼多的票，沒有這麼高的人望。這是一。

其次，在一九四六年國會大選中，美國投票人只佔全人口五分之一（不到三千萬），許多人認爲民主共和兩黨一丘之貉，寧願棄權。而一九四四年羅斯福第四屆當選時，投票人達七千萬。這次華萊士競選，必有不少在一九四四年投羅斯福的票，而在一九四六年棄權的人，投他的票。

第三，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蓋洛普民意測驗所曾做過一次測驗，題目是：「如果華萊士開始組織一個新的自由的黨，你在下屆大選時，願選他爲總統嗎？」參加測驗的人，百分之十三說：「是」，百分之十九說「沒有決定」，百分之六八說「否」。這是半年以前的事，而且距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的大選還有一年半的時間。

第四，美國自二十世紀以來，兩大黨在總統競選時所得選票，相差不超過三百萬張。假若一九四八年大選總投票人爲五千萬，再假如蓋洛普的民意測驗到一九四八年底還合乎事實，則華萊士所能的票數，可以超過足以左右兩大黨平衡的兩倍的票數。

第五，事實上在未來的十一個月中，美國外交內政的反動性格，必然逐步加強，人民在政治和經濟上所受苦痛就更加深刻。目前還在徬徨無主的人們，必然會看清已經給華萊士高舉起來的旗幟，堅決地走上鬥爭的道路。

一九四八，一，一一，寄自紐約

馬歇爾計劃與英國

英 R. Palme Dutt 作
費適 譯

「一個失去了一切性格的力量的民族——指每一民族自動屈服於壓迫者威脅的情形——在任何這種壓迫的行動中，是不能找到抵抗的充份立場的」

一

英法地方選舉中右派的抬頭在美國報紙上被公開稱爲馬歇爾計劃的勝利。紐約時報對工黨在英國市選中的失敗發出了嘲諷的論調說這乃是「馬歇爾計劃的第一次紅利」，李普曼也說，西歐的「冷仗」已經勝利。

套在十六國頭上的羅網愈抽愈緊；法義勞工反對國內法西斯和外國統治的鬥爭令人回想起抵抗運動的性質，這猶如希臘反抗同一壓迫者的解放鬥爭，是很明顯的。然而，仍有天眞的人們，似乎僅看到了馬歇爾計劃中穌心腸的美國富翁們的仁慈，因而對於任何國內政治上的反抗表示了驚異。

開始時候的經濟和金融的干涉，現在已日益公開地呈現了政治的性質。天眞無知的人們，當記得從前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所定的原則吧：「聰明的征服者，總是一步一步來進行勒索的，……從勒索而逼成被動接受的次數愈多，那末，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任何抵抗就愈少合理，卽使是當那被屈服的國家在長期不斷壓迫的最後一幕中發動武力反抗的話。而這，對於那些已忍耐地默默地接受了苛刻勒索負担的國家，尤其如此。」

馬歇爾和哈里曼先生們，顯然研究過這本教科書，並且得益非淺。開始是對英貸款協定的條件；貿易和貨幣自由的放棄；然後是日內瓦條約的進攻，摧毀了帝國優惠制的機構；然後是在美國控制之下，恥辱的巴黎報告書一寫再寫；然後是二百十五位美國議員組成的美國委員會調查他們歐洲新產業的資源；然後是接受馬歇爾的新建議，由總統委派美國的「監督機構」，並在每一「西歐國家」設立「地方機構」；直到最後，當這些降服國家的官方報紙出現了「國家獨立」的思想時，也將被斥爲陳腐的神話了。倫敦「經濟學者」這樣寫道：

「馬歇爾先生聲明中所暗示的若干條件，確是多少侵犯了國家的獨立。而他們是要這樣做的。」

讓希特勒來替「經濟學者」作個評語：

二

讓我們揭去這僞善而仁慈的烟幕，來面對事實吧。馬歇爾計劃的目的，公開地是政治的和戰略的。哈里曼的報告書說：「美國在歐洲的利益並不能單用經濟名詞來衡量。它是政治的也是戰略的。我們都知道，我們在今天的世界上面對着兩個衝突的思想。一個是維持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制度。還有一個相反的制度則是國家的鐵的紀律，無情地破壞了個人的自由。」

這裏，問題明白地說出了：「個人主義」卽資本主義，對抗着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報告書又宣佈它的任務是在擊敗「共產主義的戰略，」它說：「因此西歐諸國必須恢復到一種地位，務使他們能夠保持對於世界事情傳統態度的效力的充份信心。」

蓋爾特（Stuart Gelder）曾在十一月十七日的新聞紀事報（News Chronicle 自由黨的）上總結了馬歇爾的立場說：「馬歇爾先生不相信美國不經另一次的世界戰爭，就能保持她的獨立，因爲，假如經過了歐洲和亞洲的經濟崩潰，共產黨將在東半球的全部握取了政權。他認爲如果歐洲和中國從經濟和政治的絕境中崩潰了，事情就會這樣的發生，而共產黨對半個地球的統治，將是馬歇爾計劃的對立物。」

同一位記者，又分析了貝文外相在國務院眼中的任務：本星期中，有一位國務院的高級計劃官員曾對我說：「沒有貝文，馬歇爾也許將面臨着一個冷淡的世界。我們認爲這正是英國有權自稱爲世界強國的證據，她的領袖之一，已經看到馬歇爾的理想和美國的經濟力量，乃是對抗共產主義不可避免地興起的崩潰中的民主國家的最後防禦。」

「另一次世界大戰。」「反抗共產主義不可避免地興起的最後防禦。」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的遠景。這也就是貝文的遠景。那陣營是非常之分明的。在一方面，歐洲和亞洲的人民，以共產主義爲先鋒，爲解放和社會正義而鬥爭，並「不可避免地」擺脫着美國的干涉而進向共產主義。在另一方面，作爲反對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最後防禦」的美國，則支持着歐洲和亞洲的右傾政權，並以貝文—白魯姆—許曼型的替罪羊來執行工作。

爲了這目的，金圓被用作了釣餌，英國必須硬撐着兩百萬武裝或供應他們的部隊，而人民日益受苦。在美帝國主義所計劃的這一世界鬥爭的相當階段中，於是有緊急預算案、市選和摩斯萊（英國法西斯領袖）的再起。

爲什麼緊急預算中所規定的兩億零八百萬鎊的附加稅，要把它四分之三的負担，加在工人和低薪收入者的身上，而富有者的負担僅佔四分之一？爲什麼物價飛漲、糧食補助金却釘住不改，而衣着補助金甚至還取消了呢？爲什麼收回了二億鎊的建築資金，而使住屋、學校

和平大飯店

馬歇爾 貝文

巴黎飯店的豪客

、醫院、新的工廠或工業設備遭到嚴重的打擊？……「拯救西方的文明」？

是的。我們爲了「拯救西方文明」的光榮而償付代價——白金漢宮、皇室大婚典禮、赫斯脫和好萊塢的文明——還有希臘大亨的文明。我們爲了歐洲反共「最後堡壘」的光榮而償付代價。貝文不是在薩伏依的旅館裏，說着「我親愛的美國人」，說着「英國是歐洲的一個大堡壘」，爲了「西方的文明」，說着「工人的生活水準也許要低落」，而「我們不會失敗」嗎？

英國大使不是在紐約說，工黨政府代表歐洲的「反對蘇聯領導」的旗幟嗎？蕭克勞斯爵士（Sir Shaw-cross）不是在紐約的外國新聞協會中說，英國「決不受國家社會主義或自由資本主義敵對的兩極的虐待和奴役」嗎？後來不是又在大笑中改變了口吻，說他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當然是指「共產主義」？摩斯萊爵士不是也加入了這快樂的宣揚貝文福音的合唱，說英國必須與美國聯結，以保持「西方文明的殘餘」，並且要求「成立西方的聯盟，把世界從野蠻人手中救出來」？

好一個合唱！好一個一致！在這因襲希特勒的神聖的一致中，我們對於工黨政府的命令警察來保護摩斯萊和法西斯主義，對於英國兵士被派到希臘去保護納粹式的恐怖和酷刑，還能有什麼稀奇呢？我們在國外傳佈着災難，而能希望國內避免麼？

三

那徵象確乎是危險的。政府現在的做法，不但是欺騙和不信任勞工運動，並且把大部份的人民，驅入了保守黨的懷抱。除了不斷的撙節減削之外，它已沒有了什麼遠景，而這一切減削的結果，照克里浦斯自己的話說，必至於造成「經濟的絞殺」，或無告的金圓的附庸。何況杜魯門總統的演說中已經表示，臨時的金圓援助，將首先給德國、奧地利、義大利和法國而並非給英國；因此，英國在最後黃金準備的迅速耗竭中（這已和美元貸款一樣迅速的在消耗着），將首先深深地沉入了破產，而最後終將淪於完全倚賴的美國衞星國的地位。

到那時候，投降與獨立的選擇將比現在更困難。現在正是鬥爭的時候。只有勞工運動的迅速覺醒，纔能改變現行的道路，阻止保守黨的重返，組織提高水準的生產，終止與美國反動派的破壞性聯盟，纔能同世界自由進步的人民，向着經濟復興與和平前進。

（節譯自美國"New Masses"）

社會民主黨在歐洲：左乎？右乎？

英・James Klugman　史煉 譯

最近，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在報紙上佔了很多的篇幅。對於我國讀者，這是一個令人摸不大清楚的問題。這篇文章載在英國「勞工月刊」去年十二月號，材料豐富，分析清楚，可以幫助我們對於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的認識，特爲譯刊於此。——譯者



由於他們反對工人階級統一的不斷鬥爭，由於他們對蘇聯的仇恨，由於他們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遠勝對資本主義和反動派的憎恨，歐洲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在兩次大戰之間、慕尼黑事件和第二次大戰中，對於希特勒開路的這一工作，是扮演了一個並不很小的角色的。在這次戰爭中，幾十萬社會民主黨員自己的國家被希特勒攻擊或佔領了，他們遙望着紅軍的驚人勝利，而這些勝利者也就是他們的領袖們過去所告訴他們所應該恐懼和輕視的對象；在許多地方（如東歐）他們被紅軍解放了；他們也看到，共產黨領導了民族解放運動和反軸心的抵抗運動，而常常和他們並肩作戰，或在他們領導之下。那些社會民主黨的工人、農民和智識份子等都爵誓永不再重復回到過去右翼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他們的解放使他們看到正與共產黨一同爲了社會主義而繼續鬥爭。這樣，在戰爭結束後，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義大利的社會民主黨就把他們舊傳統和舊習慣打得粉碎，他們舊時的領袖大部被更換，而沿着新的進步路線重新活動了。在歐洲其他國家，過去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們，特別是那些在戰時出亡國外，與他們國內人民毫不接觸的那羣領導者，卻絲毫沒有學得什麼或懂些什麼。當戰爭結束後，在法國、荷蘭、比利時、丹麥、瑞典、和德國西部，他們受了英國工黨右翼領導者們的好心的支持，而使他們重又回復到他們過去的使命和活動來反對工人階級。後來，在英美的壓力之下，一小部份反動的分裂派又從那些採取和共產黨統一行動的社會民主黨中分裂出來——義大利的薩拉迦脫（Giuseppe Saragat）羅馬尼亞的柏特拉斯克（Titel Petrescu）保加利亞的盧爾琪（Lulcheu）和匈牙利的柏耶（Karolyi Peyer）等。今天，歐洲每一個社會民主黨在統一抑分裂工人階級的左右翼的鬥爭中，正或多或少地繼續和加深。

這是今天主要的政治論點：對工人階級統一的態度、對蘇聯和東歐新民主的態度、對美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態度、對社會民主黨和馬克斯主義理論的態度等——從對這些理論和實踐顯著的分野上，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左右翼是很明白地被顯示了。

*

在義大利和東歐各國，社共兩黨的緊密合作和行動的統一已發展了。在一般的政治領域上，工人階級的力量和影響都已不斷增高了。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義大利社共兩黨的統一行動協定，和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波蘭社會民主黨與波蘭工人黨的統一協定，使社共兩黨各種程度上的合作奠立了基礎和趨向。同樣條約在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也都存在。

在這些國家中，社會民主黨「左邊的敵人」是沒有的，雖然英國工黨右翼領袖或美國勞工聯合會曾藉此企圖使他們屈服。波蘭總理兼波蘭社會民主黨總書記錫倫柯維茲（Cyrankiewicz）寫道：

「我們今天並沒有忘記那些今天佯裝對波蘭民主社會黨深深敬愛的那些人們，不過他們的愛我們，並不因爲我們是社會民主黨的緣故。他們向我們丟送秋波，這是因爲他們被幻想的希望所蔽了，他們希望我們爲了波蘭反動者的利益而向波蘭工人黨開戰。那些反動份子希望第一要我們先收拾了共產黨，而當我們單獨站立時，

反動派就會來收拾我們了。

波蘭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團主席霍其飛（Julian Hochfeld）在波蘭「社會民主黨評論」的一本月刊上寫道：「……歐洲工人運動的工作只有統一戰線纔能實行。社會主義運動，這在波蘭已經實行了的，必須明白指出，它的路只有一條：向左。」義大利社會民主黨領袖南尼又作證明：「工人階級的聯合只有吸引而不會排斥中產階級；整個國家特別是中產階級將很快的信服，一個強大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聯合一致纔是反對內戰和全體主義的最好保證。」

反對這社共兩黨聯合而站在完全相反立場的是右翼社會民主黨的態度，這包括那些文字上裝飾得極爲左傾的那些人。法國的萊翁·勃倫和莫萊（Guy Mollet）、比利時的勃勞革爾（Brouckere）、奧地利的寶拉克（Pollak）、德國的蘇馬赫（Schumacher）義大利的薩拉迦脫、以及那些標榜着「反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反對右派或左派獨裁」和掛起「中間路線」、「第三種勢力」招牌而與右翼社會民主黨一鼻孔出氣的人物，這些人從工人階級和進步勢力中間分裂出來，而成爲美國國務院白色的希望。

舉一個萊翁·勃倫和法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的例子吧。在解放後的首次選舉中，兩個法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一同在國民議會中獲得了一個壓倒多數的選票。這個地位便利了他們作爲法國人民的領導，以使他們繼續抵抗運動時的熱情和勇氣走向新的人民的民主，消滅法國托辣斯的力量。然而當時萊翁·勃倫宣佈「唯一可能解決方法」是和法國天主教黨和法國人民共和運動黨訂立三邊協定。從那時起，法國社會民主黨反對聯合的鬥爭就變得愈加尖銳了。法共建議訂立統一行動條約被拒絕；在美國命令之下法國的最大政黨法共被排出政府。在最近一次的市選中，法國社會民主黨與戴高樂派和人民共和運動黨聯合一致而擊敗法共的候選人。社會民主黨的勝利建立在法共所被損失的選票上。在巴黎的四郊地帶社會民主黨有百分之十的選票，共產黨卻有百分之四十五，社會黨的候選人是被戴高樂派所推選的，例如在蕭西拉洛（Chisy-le-Roi）共產黨得有市議會二十七席中的十三，一個社會黨的市長是由十個戴高樂派，兩個人民共和運動派和兩個社會黨所選出的。這樣萊翁·勃倫的「第三種力量」政策的目的是達到了，所以他說，他對共產黨和法西斯「同等待遇」，而最後卻是與法國反動派聯合一致而反對工人階級。不過這也使社會黨的本身削弱和分解了，他的選票從解放後第一年的四百五十萬減至二百七十萬，而在上次市選中雖然贏得了共產黨和戴高樂，但是它卻失去了它的主要的支持社會民主黨的傳統中心，包括慕爾哈斯（Mulhouse）保達（Bordeaux）南茜（Nansy）尼斯（Nice）和里萊（Lille）這些地方在過去五十年中是完全由社會民主黨所統制的。

＊

同樣尖銳而清楚的分野是社會民主黨對蘇聯的態度。東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毫無例外地，是站在該國與蘇聯密切的經濟與政治連繫的立場上。他們認爲蘇聯是世界和平的主力。他們支持蘇聯代表在聯合國內的鬥爭。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總書記柴卡席炎（Arpad Szakasits）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說：

「我們能夠想像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蘇聯更可以作爲每一個眞實的社會民主黨員爲民主勝利的希望的結實基礎嗎？單是從他的存在這一個事實看，蘇聯就是一個爲人民自由鬥爭、爲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不會枯竭的力量的源泉。所有好戰的企圖在由蘇聯及其人民所築成的花崗石牆前將被擊得粉碎。」

在這一點上歐洲右翼社會民主黨領袖們是又與它尖銳對立的，這些人如萊翁·勃倫、寶拉克、柏里多（Priets）、蘇馬赫，而他們又被反蘇領袖貝文、承繼了考茨基衣鉢的奧多·巴爾（Otto Bauer）希爾福丁（Hilferding）安德拉（Adler）許文尼爾（Schevenels）等所鼓動。

＊

東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義大利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及其他人數與日俱增的社會民主黨，正堅強地在保衞他們自己國家民族的獨立，以抵抗美國經濟和政治的擴張。這些國家不依賴美國附有政治條件的借款，而支持自己國內經濟計劃的發展。東歐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否決了馬歇爾計劃，當時，義大利社會民主黨領袖南尼警告義大利人民說，經濟上依賴美國也就是將災難帶給義大利的人民。

波蘭社會民主黨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決議中稱：「在美國，大資本家的反攻已經開始了。在戰爭中，美國犧牲了全世界而自己發了財，它已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的象徵和希望。結果美國已在內外政策中開始了一個鐵腕政策。在美國金元攻勢的周圍，今天正集結所有歐洲社會民主黨和非歐洲的反動份子、所有被擊敗的納粹殘餘，他們被美帝國主義供養着。在許多國家中，右翼的社會民主黨員正向金元攻勢投降，而實際上成爲美帝國主義利益的保衞者。」

薩拉迦脫、柏耶和貝特拉斯克「靈感」地從他們各國主要社會民主黨機構中分裂出來，是直接被美國反動份子所準備的，這個疏通工作往往是通過美國勞工聯合會中右翼領袖。比利時右翼民主社會黨總理史巴克曾說馬歇爾計劃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前鋒。據義大利社會民主黨報紙說，西德社會民主黨領袖蘇馬赫「非常留戀着韋瑪共和國的總統依貝特（Ebert）」，他是正在更換主人的過程中，讓美國勢力代替英國的勢力。萊翁·勃倫正毫不怠慢地進行着說服法國和歐洲接受美國領導的運動。在八月中他發表了一篇「國際經濟問題」的論文，號召採取「由美國所發起的國際經濟組織計劃」，他並攻擊蘇聯保衞國家主權的「破舊觀念」。他這樣呼籲，然後又高聲支持馬歇爾計劃。他到處在替美國托辣斯的純潔、不自私的動機辯白。他說美國不需要出口。「我深信美國是眞正公正的。」他自己，在訪問華盛頓期間，就發動組織美國向法國的經濟侵入。無怪乎一九四六年三月的美國「生活」畫報，一當勃倫到了美國，就用大字印上「歡迎萊翁·勃倫先生」，它並且告訴讀者說，大家儘管猜疑勃倫可能是法國的「新政主義者」，但應該記住他現在是站在恢復西方法國的立場的。

這樣在理論和實踐上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就變成世界主要反動力量——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工具，在世界政治領域上，他們又從艾德禮和貝文的工黨政府及拉瑪第的社會黨政府收受了如此強大而持久的支持。在東歐和義大利的社會民主黨（雖然在義大利，當然還是有着困難和猶豫）與共產黨愈趨緊密，統一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共同與國內外反動份子鬥爭，在思想上也更趨一致以準備實現歐洲勞工運動的最好最全面志向的實現——工人階級各個政黨的有機統一。在所有的社會民主黨內，無論它的領導如何，他們是有一個強大而日益成長的潮流，這是有利於工人階級的統一的。在英國內部，因爲工黨政府和勞工運動有着不同的構成，它也表現了不同的形式，它們內部左右翼的鬥爭正發展着並日益緊張。

自從一九四四年底以來每一次連續的五次國際社會民主黨會議，都使它的左右翼鬥爭愈來愈尖銳。下一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比京不魯捨爾所召開的第六次大會中，當重組第二國際和承認德國社會民主黨，這兩個重大的問題再被討論的時候。這兩條陣線的鬥爭，將反映得更爲清楚。

希臘問題的考驗（上）

美G. Polk作 梁 行 譯

本文原載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份美國「哈潑雜誌」，作者樸爾克（George Polk）現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駐開羅特派員，他在戰時是海軍戰鬥機的機師，後來一度專爲「先驅論壇報」撰述關於白宮和國務院的報道。這篇關於希臘問題的文章，在材料蒐集方面頗見用力之勤，在一個同樣喘息於高物價和炮火雙重苦難中的中國讀者讀來，感觸尤爲深刻而痛切。作者是美國人，有許多議論當然是從美國特殊的立場出發，偏狹之處在所難免。凡夾雜有政治教訓之處，略加刪節，此文可貴的是事實素材，在不背原意的壓縮中，希望仍可以窺見希臘動態的一斑。——譯者

一

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希臘軍將成爲希臘政府唯一正式行使職權的機構。目前的美國官方政策扶育了這一軍事巨獸，到那一天，就要在巴爾幹半島上把它放縱開來了。

當去年春天，美國國會通過三億美元軍事及經濟援助的時候，我們的方針顯然是因爲撤廢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以及不久英國援助也將撤退，而要去填塞那個空隙。美國的援助計劃不過是一個填塞空檔的暫時權宜之計罷了；它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美國財政年度結束之日，就要宣告終止。可是，美國干涉了希臘事件不到幾個月，就越來越捲入到漩渦中去，和希臘問題糾纏而不可解脫了。

在美國財政年度結束之日，希臘軍將獲得大量美國軍火的供給。希臘的十二萬至十五萬軍隊坐的將是美國車輛，輪胎和汽油也全是美國貨。希臘兵每天將得到三千七百卡洛里（Calories）美國軍事配給口糧，——較之希臘其餘的人口，卻只能平均得到二千卡洛里。

照現在看來，希臘本身絕對沒有力量維持這樣一個軍隊的龐大開支。即使根據頂樂觀的估計，希臘至少在五年之內是無法自己維持的。要最低度地恢復希臘戰後被毀的經濟，起碼也須花一千五百億美元纔行。

在現狀之下，聯總的機構已經撤廢，英國自顧尚且不暇，因此，只有美國纔是希臘政府唯一的希望，可惜的是，我們的援助計劃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就正式終止。如果到那時美國的援助完結了，這消耗金錢與人力的軍隊，就完全非靠一個不能養活自己人口的國家去維持不可。這情形是不可想像的，打開僵局只有一條路：歡迎強力的人上台——不是極右就是極左。

奇怪得很，這樣二個人的名字都是從Z字開頭的。右派的齊爾伐斯（Zervas）年五十七歲，肥、矮、身體結實，眼近視，但不常戴眼鏡。他是一個老兵，職業的賭徒和不道德的政客。早年愛蓄長鬚，穿花花綠綠的制服，現在改穿了深色西裝，裝得很有身分的樣子。可是他所有的活動，不論公私，都比戰前參加四次希臘政治革命的時候更惡劣無恥了。最近保王黨組閣，他曾任公衆秩序部長，他在任上開始對政府反對派加以殘酷的鎮壓，不問其政治信仰如何。有一個祕密的美國官方文件，稱齊爾伐斯「有獨裁和法西斯的傾向」，又說「和美國的民主理想是背道而馳的」。不論他在朝或在野，總有一批英人組織的希臘憲兵隊支持他，其中許多官兵在淪陷期內曾給德人當過差。

左派方面頂有強人資格的是柴卻利亞特斯（Zachariades），他和齊爾伐斯不同，是一個腦力勝於體力的人。他是忠誠獻身的黨員，據說又是莫斯科遠東研究學院最優秀的高材生，他現在是希共的書記長。大家都知道他是希共的靈魂，可是他在過去一直不大露面。他在牢獄裏消磨了很多生命；在戰前，當他四十四歲時，梅泰克塞斯在希臘樹立獨裁政權，大事搜捕異己，他也在被銖之列，在集中營中住了將近十年。德國人把他從希臘解送到達旭（Dachau）集中營，直到後來，美軍纔把他放出來。柴卻利亞特斯是一位天才的演說家，又是一位卓越的行政家，如果一旦共產黨掌權，他無疑地會有一個復興希臘的計劃。

不用說，美國是不歡迎希共掌握政府的，恰恰相反，美國的援助計劃正是要阻止希共勢力的擴張。可是，趨於另一極端的法西斯化，也不是美國所樂於接受。一切都在醞釀演變之中。希臘今天的重要性實在超過了它狹小的土地及人口所昭示的。正因爲如此，希臘問題不得不成爲美國外交政策的考驗之所了。

二

戰前的貧困，再加上戰時驚人的破壞，造成了異樣嚴重的希臘問題。在一九三九年所有的一百七十三萬五千幢大小樓房中，四十萬幢被破壞掉了。用人類的困厄來計算，有十六萬農家和十萬城市家庭顛沛流離，備受無家可歸之苦。希臘戰時的損失，包括建築物、橋樑、鐵路及公路交通、船隻航運在內，若要修復，須花費達二千億美元之鉅。加之，在戰爭中，大部分戰前的小工業也都化爲灰燼。因此，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都僵化了。可靠的失業統計不能得到，可是我們知道，有一百四十萬希臘人藉直接賑濟維持生活，內戰發生之後，從游擊區逃出來的難民也達二十五萬餘人。千千萬萬希臘人患着營養不良症以及隨伴而來的症象，諸如肺癆之類。

希臘的財政情況也是非常悲慘的。按之官價，美元值五千德拉克梅（Drachmae，希幣制單位）。然而，非官價的黑市價格，一元美金卻要值到九千德拉克梅。黑市變成了國內最大的商業之一，——每年轉折的資本總額達二十億至四十億美元之鉅。黑市危害希臘的經濟，可是，大戶仍要操縱行市的上落，從買空賣空中搾取利潤。

只有一個財政問題，希臘是用不着担心的——那就是製造實幣的問題。因爲希臘最大的票面是二萬德拉克梅（值美金二元多一點），還值不到印鈔票的錢呢。在戰前，同樣的這張鈔票好值差不多二百元美金。通貨膨脹反映在希臘一切的統計數字上面。較之一九三九年，工資漲了七十七倍，衣料二二三倍，食料一六八倍。

可是，早已有過一句俗諺，「希臘和貧窮永遠結爲姊妹」。早在一九三九年，希臘就是歐洲生活水準最低

落的一國。那時希臘每一平方公哩的土地上住有三三六人，而保加利亞是一四〇人，南斯拉夫一八一人，羅馬尼亞一二八人。如果希臘的土地非常富饒，這數字倒也未可引以爲貧困的證據。不幸的是，希臘的七百萬人住的卻正是出名貧瘠而不生產的土地。

在戰前的年月中，希臘三分之一至半數的小麥仰給於國外，因此，耗費的外匯殊屬不少。大部份紡織原料和幾乎全部的機器，也都取諸外國。此外，希臘還缺乏鐵、煤、煤油。

同時，希臘不大有東西輸出到世界市場去。煙草是輸出的大宗，佔希臘運往外洋的貨物之半數。(大部份「土耳其」煙是從希臘卡伐拉區來的)。葡萄乾也是著名的。希臘的商船也很生利，因爲希臘水手的工資賤。

然而，即使在戰前，希臘貿易的平衡也是入超的。事實上，希臘只有靠海外僑胞的匯款才能維持平衡(僑民分佈在美、澳、南非等地)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移民已不可能，而早先的僑民都已死去，第二輩自視爲外國公民，都不再認爲是希臘人了。

今天世界上任何以農業立國的國家，恐怕經濟情況都未必有像希臘這樣糟的吧。

希臘戰前的問題，再加上戰時的破壞，即使大家努力設法解救國家的危機，也早已是相當麻煩的一件事了。何況事實竟有大謬不然者。希臘的放款人、大商人、雅典的大船主們，對於希臘的將來竟很少，甚至毫無信心。普通說「比你設想的更遲」，說這話時還有僥倖一試之心，現在希臘人索性這樣說了：「已經太遲了」。因此，有錢的人只顧保存他們的錢財，而他們採取的方法正好是危害國家復興最甚的。

這些方法很便當，因爲希臘經濟一向是被緊緊地統制着的。三十五家族在財政上支配着全國，通過互相勾結的幾個董事會，把他們的魔掌伸展開去。作爲他們經濟機構的支柱，是希臘國家銀行，那是一個私人投資組織。這三十五家族是希臘的統治集團，人數只佔希臘人口的百分之二。

只有土地所有，還算是這百分之二統治集團所支配不到的禁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凡尼齊洛斯(Venizelos)政策使希臘變成了小土地所有的國家。現代希臘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凡尼齊洛斯，對共產主義的威脅有先見之明，他很了解農民的痛苦。他分割了大田莊，拿來分配給千萬個農家。

作爲一種社會實驗看，除了蘇維埃治區之外，凡尼齊洛斯政策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雖然如此，希臘卻還是一個大商業的國家。由於政府監督限制頗多之故，它的經濟體系主要的是對於特殊的個人有利的。人們不能隨隨便便就開辦工廠，或籌設進出口公司；他在事先必須取得政府的執照。而這政府執照，只發給「正當人士」，也就是在政府裏面「有路子」的一些人。這制度造成了異想天開的種種不正當的商業投資局面，我們只要在雅典的街上蹓躂一趟，就可以看出來了。

雖然希臘是一個赤貧的國家，可是雅典的商店卻堆滿着許多奢侈物品。價錢是全世界最高的。龍生打火機在紐約賣八元美金，在開羅賣十元，在耶路撒冷賣十二元，在雅典賣到十五萬德拉克梅。所以，照官價，值三十元美金；照黑市計算，一隻打火機值十七元美金。派克五十一自來水筆在紐約賣十二元五角，在雅典賣二十五萬德拉克梅，官價等於五十元美金，黑市是三十一元。英國上等毛織西服，每件價格從二百七十五元美金起。爲了要看看哪些人來買這樣貴的東西，我曾花了一小時工夫，在雅典著名的憲法路上看了八家舖子。老闆們爲什麼不削碼，以求脫售更多的貨物呢？

答案是十分簡單的。店主們不願意脫售。這些龍生打火機啦，派克五十一鋼筆啦，毛織貨啦，都是囤貨—顯明的囤貨。由於通貨膨脹日增無已，店主對於德拉克梅早已毫無信仰了；他們投資購買貨物，標上高價，然後靠賣得的錢過活。一天賣掉一件就夠了。總之，希臘人爲了避免貨幣貶值，就拚命地囤積。其次，囤積物件的靈巧與可變換性也是要注意到的，因爲一旦臨到急變，就可以隨身帶着貨物高飛遠走。

我碰到一個雅典的珠寶商，普通一隻在瑞士標價廿五元美金的錶，他要賣到二百塊美金，我問他爲什麼如此居奇。他回答道，希臘任何一個人都不相信將來；大家都想下的本小，收的利大，而有錢的人何時必須逃走，誰都不能預測。說不定明天就會來一個政變，或爆發一場大戰。因此，他必須準備任何時候很快地就把店門關掉，把資本用可變換的小貨物的方式移轉到外國去，例如買英鎊或美金等等。

當然，在緊急時能夠離開希臘的，只有那些藏有外國錢和靈巧可變換的貨物的人。這樣一來，這些有錢的人就把赤貧的希臘放在一種驚人的商業壓榨機裏去了。這壓榨機，不但榨取奢侈品，並且也同樣地榨取日常必需品的可憐的顧客們。舉例說，爲了調查毛巾的價錢，我在喧囂的雅典中央郵政局外面，碰到一個推車子吆喝的小販。在這地方，有千百種商販的吆喝聲，夾雜着電車的叮噹，古老的出差汽車發着尖聲急馳而過。我問了問一塊看似很便宜的毛巾的價錢。他要我三萬五千德拉克梅——官價是七元美金，黑市是四元五角。我告訴他，同樣的毛巾在紐約只賣一塊錢不到，小販就給我訴說起他的故事來了。據說這三萬五千德拉克梅的毛巾，他花的成本就得三萬一千德拉克梅呢。可是，當我去問批發商，才知道他們到外國去訂貨，只花九千德拉克梅。這樣近乎詐騙的商業方法，只因爲批發商又有資本，又有進口執照，才能肆無忌憚地抬高價格。在這國內，資本早已只集中在人數甚微的小集團的手裏了。由於官府的袒護，進口執照又爲這同樣的小集團所專利。因此，代表希臘人口百分之九十八的毛巾小販和他的顧客們，是在急迫需求和限制供應的二重壓榨之中。



導演與演員

(未完)

重返蘇聯

英 Alexander Werth 作
淑之 譯

基礎，而南斯拉夫還祇在蘇聯一九三〇年代早期所經歷過來的「羣衆熱情」階段，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東歐各國的生活水準也不會達到平均的水準，但這裏的人認爲各國既然採用了計劃經濟(卽是「眞正」的社會主義)，

基礎，而南斯拉夫還祇在蘇聯一九三〇年代早期所經歷過來的「羣衆熱情」階段，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東歐各國的生活水準也不會達到平均的水準，但這裏的人認爲各國既然採用了計劃經濟（即是「眞正」的社會主義），因此都朝着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經濟危機和蕭條的危險已經被減到最低限度，唯一不能估計的因素，只是氣候而已。在蘇聯我們時常聽到的一句話（決不限之於共產黨員們）是：「我們多少總知道我們現在向那裏走，我們總有一個希望。但是，西歐可知道自已在向那裏走嗎？」

蘇聯人所聽到和讀到的關於西歐的種種，無疑是頗多渲染的，但是有誰能否認，在法國極少數的人靠黑市過着優裕的日子，而廣大的人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却生活在慘苦中呢？蘇聯人爭辯說，偶爾的打「金元針」，決不是補救辦法，尤其是這些「金元針」都附有條件的。一個蘇聯時論家說，「美國想用民主的名義，排斥法國三分之一的人民（共產黨員）。」這件事，和希臘及「黑人問題」，都被認爲是暴露「西方民主之純潔」的無可辯駁的論點。

在華沙九國共產黨會議的聯合公告中，貝文和艾德禮自然受到猛烈的抨擊，因爲在蘇聯人看來，他們是「爲了一堆臭金洋鈿出賣歐洲社會主義天生權利」的中間人。蘇聯人堅持說，這個新共產黨組織並不是要在歐洲推行共產主義革命，而祇是對付馬歇爾計劃和其他資本主義計謀的防衛措施而已。如果我們對於他們的說法能夠獲得正確的解釋，我們就可以明白「右翼社會黨人是歐洲民主的最壞的敵人」這句話的意義了。

——譯自「民族」週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二日號



重返蘇聯

英 Alexander Werth 作
淑之 譯

這篇通訊的作者，曾經担任過倫敦星期泰晤士報的記者，現在是美國「民族週刊」和英「孟徹斯特導報」的駐莫斯科通訊員。他在去夏離蘇他去，十一月重返莫斯科。小別三月，蘇聯的建設却已增添了不少。這篇特寫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我們小別數月，回到一個曾經住過相當時間的國家，總會覺得一切沒有如我們預想的那般改變得多。這一次我重踏上列寧格勒的陸地，護照檢驗員和過去一樣的客氣，那位老海關檢查員同上次一樣的漫不經心、愛開玩笑。在碼頭上，一羣人帶了照相機、擴音機和一束束的秋花，正在熱烈歡迎倫敦勝利歸來的象棋手隊。棋手們作簡短的演說，稱道英國象棋技術的高明，把他們此番的勝利，歸功於「蘇聯體育當局」和史太林同志慈父般的愛護。

列寧格勒在這黃熟的秋日又復活起來了。聖伊薩克的金圓頂和海軍司令部的金尖頂，在陽光中閃爍。聶伐河是一片鬱藍色。街上似乎比夏天更熱鬧了，雖然還比不上莫斯科熱鬧。有好些列寧格勒的家庭仍住着一層樓，有三、四個房間。重建海濱休息所是列寧格勒戰後成就之一：在從前的芬蘭卡里林土腰上，又重新造起了許多平屋、療養院和浴室。在一九四四年被德國人燒掉的曾斯谷、西樂官殿，也在重建之中。列寧城的工業，同一九四六年一樣的被列爲復興工作的第一項。

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的火車上，我注意到，僅只三個月的時間，戰時破毀的村莊的重建工作，已有了極大的進展。車站上出售的食物也比較多了。紅箭號列車已經從十四小時縮短到十三小時。據最近的統計，在俄羅斯本部的鄉間，已經有四百萬居民從防空洞搬回屋子裏居住了。

× × ×

這一次我重返蘇聯，有兩件事情特別吸引我的注意：因穀物收成較好而物質條件已較改善；人民對於「美國威脅」敏銳焦慮的關切。雖然食物和衣着大部份仍須配給，但是莫斯科的消費品供應量已經比三個月前增加了許多——大部份是本國貨，也有從捷克、波蘭和德國來的。按莫斯科的物價來說，家用物件、無線電和一些別的物件，甚至在非配給店裏也很便宜。人民熱切地讀着報上的國外新聞，研究聯合國大會上辯論的詳細報告，希望發現國際環境改善的可能性有多少。維辛斯基的「反對戰爭販子」的演說，給蘇聯人民的印象很深，特別是他把「戰爭販子」的名字都列舉出來，還引錄他們的言論。大家都覺得這是情勢惡化的明證，因此，人民團結的意識似乎大大地提高了。這變化是非常引人注意的。

去冬我們很少聽到工業重建的進展，在春夏兩季，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農業上面。共產黨想盡一切方法來達到豐收這一目的，雖然穀物的收成還比不上戰前最好的一年。現在，關於工業的消息却高起來了。柴普羅齊鋼廠的重建是個最好的例子：爲了要白手重建這些巨大的工場，必須招來大批的技術人員，還須從全國各地配合至少六十種工業以獲得必需材料。另一個全部重建的工廠是伏洛納茲的人工橡膠廠。假如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工業重建僅只勉強完成了五年計劃中的預定工作，那末自從四月以來，已經有了不斷的、長足的進步，而現在，已經使人覺得工業的輪子終於正常地轉動了，只要國際氣候允許的話，這五年計劃在一九五〇年是一定可以全部完成的。

× × ×

在蘇聯人的心目中，馬歇爾計劃象徵着整個美蘇矛盾。他們認爲就使美國在歐洲的投資達到天文學的數字，到頭來也還是不中用的。但同時他們認爲這計劃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險的，因爲他們深信美國無論送錢或借錢給歐洲，每一分錢上都會附有條件的。他們認爲馬歇爾計劃是一種掩護工具，以達到美國戰略侵入歐洲和在德國西部建立反蘇堡壘的目的。

他們爭辯道，東歐各國（顯然指蘇聯、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拉夫）雖然有許多戰後的困難，但是憑着國家計劃的幫助，正在穩步地建立一個健全的經濟制度。計劃雖因各國而異；在蘇聯現在是以技術自足原則爲



假想美蘇戰爭

世界在火焰中（續五）

美 Engel 與 Piller 合著
葉夢殊 譯



當我伸手去取一枝香煙的時候，摩洛跑進來了。「我想被炸中的是在市西邊」，他說。他指着一扇開向西面的窗子。

我跟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火焰正在幽暗中向上昇騰着。「什麼人應該跑出去看一下，」摩洛提議着。「艾德，你穿着制服，不會有什麼麻煩。你去一下好不好？」我答允了，立刻走出去。

我走到離開燃燒着的地方的有十分鐘距離的一條街上。那裏是一幅可怕的景象，照出在十多輛燃燒着的車子的火光下。

許多人躺在人行道上和溝道裏。還有許多把背靠着建築物的牆壁坐着，他們的眼睛顯出一種因了強光的眩耀和震駭而造成的不集中的凝視。我聽見一個人在問，「你看見那個閃光嗎？」有許多人的面部和雙手都灼傷了。有更多的已經死了。

那條大街，芝加哥最大的一條，已成了一堆廢圮。毀壞了的汽車和卡車橫七豎八地到處躺着。有三輛雙層公共汽車橫倒在地上。許多乘客都被陷在車內，逃不出來。防空志願隊員和沒有受傷的路過者，正在設法把這些受傷呻吟着的乘客從車中拉出來。

國家廣播公司的建築是在密乞根大街上，離開芝加哥河上的大橋，有一排屋的距離。我在許多車輛和破壞物的堆中揀着路前進，走到橋邊，爲了可以淸楚地望到西南面，那是摩洛所指的爆炸中心的方向。

沿着大橋的一條軌道上，有着許多破爛的車輛，正像被一隻巨靈的手不經意地拋在那裏堆着的一樣。橋上有着很少幾個人，但都不是立着的。我看見一個婦人用手和膝爬着，她的衣服已經破碎了，正在神經地用手把破碎了的衣服拉攏來。在她近旁，一個男子向下撲着，兩臂下垂，顯然已經死了。

但是，不單是橋上的景象，使我戰慄。更可怕的是在向西南一兩哩處，城中心的景象。

芝加哥的全城似乎被蒸發成幾條灰塵的巨柱，向上昇騰，連接着上空的原子雲塊。在這些柱子的後面，天空都被火焰染成紅色。當我望着的時候，火光是更鮮耀了。幾條灰塵的柱子，似乎都被燒紅了。

在近處也有火。離開河岸對面六百碼處，也有幾處建築物在燃燒，很大的火頭從牆頂穿出，伸向天空。在河的分叉處，也有一些房屋着火。河的中流則有一道石油，浮在水面上燃燒着。

我站着一會兒，被一種驚恐與畏懼的複雜情緒所麻痺着。我曾經見到過上一次大戰中許多破壞的景象，但是從沒有什麼能夠和這個相比的。這是海爾賽筆下的「廣島」在我們自己國內的出現，而比之廣島還要可怕十倍。

而在這時候，我腦際所劃過的印象，覺得我在芝加哥所見到的是夠可怕了，而在其他同時被炸中的城市，那更要可怕的，不知又將如何。紐約，有着它那樣稠密的人羣和高大的建築，那大堆的毀壞物倒下在人羣中，結果將變成怎樣。還有第得律和它的工廠區域。還有辟茲堡和它的巨大鋼鐵工廠。美國從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破壞的。

我趕跑過橋去，幫助那個婦人站立起來。但是她被閃耀得太厲害，或者受傷得太厲害，站不起來了；也許她的腿已斷了。我決定讓她留在那裏，等到一個救護員來把她檢驗一下。我跑回來把她的情況報告給一個防空志願隊員，他答允儘速把她救回來。

我沿着密乞根大街走下去，那裏到處都是毀壞物，在街道交叉處，堆得特別多。那些交叉的街道都通到爆炸的中心的，它們對於原子彈所造成的每小時一千哩的旋風，一定是很好的疏散的通道。現在則有着一批批可怕的灼傷者和受傷者，不斷的向這些通道湧來。

當我轉到蘭道爾夫街的圓周的時候，一陣炙熱的風把瓦礫旋捲成刺痛的塵土，使我不能不閉上眼睛。當我能夠張開眼來看的時候，我見到一片我從未見過的不可思議的破亂的廢圮，而以華巴希路轉彎處爲最厲害。

到處踏在腳下的都是碎玻璃片。戲院的頂、店舖的招牌、以及建築物的大門，統統被裂開了，拋到半排或一排房屋以外。汽車和電車都撞毀在建築物上。一輛電車掛着在一對街角的傾倒着的圓柱上。看不到一根豎着的電車桿或路燈柱子。上面是一堆亂蓬蓬的電車線。

百貨商店的櫥窗全部被毀碎了。在麥歇爾斐爾特大商店和蘭道爾夫街上所有世界馳名的商店，各式各樣的貨品，衣服、人體模型、傢俱、冰箱等等，散滿在街上。那些人體模型和死屍有時都分辨不清了。我想，事實上，一個防空義勇隊，奮勇地企圖從一堆毀壞物中救出來的，正是一個人體模型，而不是眞的人呢。

在華巴希路的「L」車站，防空義勇隊員正在冒着危險從車站月台上把受傷者放下來，那月台是高出在街道之上的。走上月台去的梯階都已被炸去了，義勇隊的梯子也太低些，夠不到月台。所以月台上的受傷者是由上面的人用手抬下來，而下面的人則爬在梯上的頂格上伸着手去接的。

在下面街道上，另一個義勇隊員站着指導那些還能夠走路的受傷者。「救護站在格蘭脫公園，」他沙着喉嚨喊着，「從湖邊走過去。」

在湖的那邊，傷者成了一條不斷的長串。有的還能勉強自己走着。不過，大部分是被抬着或扶着的。那裏沒有救護車；什麼車輛都走不通了。

我竭力想參加這救傷的工作。我的肢體完全健好，自己覺得這樣無目的地走着，很受注意而不好意思。但是我的任務是儘可能多採訪一些情形。我甚至不敢和傷者談話了，恐怕我自己不能

不停下來幫助救護。

我儘快沿着蘭道爾夫街向西走，面着一個紅得可怕的天，那是這一個爆炸的頂點。在富蘭克林街，離開芝加哥河南面的支流的一排屋的地方，我見到了這城中的第一個救火隊。他們在撲滅一個印刷廠的火。從那裏往西去，差不多每一幢建築物都在燃燒。被火焰所煽起來的熱風，使人受不住了。

我走向那救火隊長，他是一看就容易認出的。

（未完）

一位純正科學家，一個巨人

Prof. J. B. S. Haldane 作　史永明譯



哈代教授（Prof. G. H. Hardy）不僅是當代英國最偉大的數學家，同時亦是全球的最偉大數學家之一，可惜已於上月逝世了。正像其他許多巨人一樣，他底觀點和工作，有些是不容易爲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他是一位非常純粹數學家。一生大部份的工作是化在數論上面。例如，他和他的助手攫住一個已知數的區分問題。假定此數是三，你可以說明它是三，亦是二加一，或是一加一又加上一，這就是說，像三的一個數目，可分裂成爲三種方式。就說四吧；三加一；二加二；二加一又加上一；或是一加一，再加一，又加一，還要加上一；總共可以有五種分法。五就有七種分裂的辦法了。

那末，對於隨便哪一個數目的分裂辦法，怎麼能把它說得明白呢？他最後是完成了相當複雜的公式，竟把這問題解決了。又再攫住類似的問題，比如一個數目可以有各種分裂的辦法，變成某一已知數的一連串平方、立方或高次方的總和。

如果有人對他說，這些工作毫無用處，他是首先承認的。他自負他的數學工作，從未用來傷害過一個光棍。而且他的數學在有些地方，彷彿是棒球。所以值得去研究的，倒還是爲了數學自身。他愛好棒球，亦是一個熱烈的棒球捧角家。他承認有很多數學家是第一流的，但他要從其中挑出一打數目來，他叫他們是跟着偉大棒球家車子後面的捧角家。

老實說他的自負是不正確的。舉一個簡單的例，有一個函數叫做呂猛氏 Zeta 函數（Riemann's Zeta Function），計算它的變化，研究它的性質，用來說明低於某一已知數的質數。哈代深深地愛上了它。但它在高溫學說裏就用得着，就是說研究鎔鋼的熱度少不了它。在現代戰爭中，鼓風爐高佔着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即使是打棒球，也有它的社交功用。例如英、澳之間的友誼，就是堅固地建築在棒球賽上面，彷彿水和泥緊緊的溶合在一起。又如印第安選手在棒球賽上精彩表演，可以使得有些英國紳士肅然起敬。在其他場合，决不會對那些棕黑色皮膚的人種有什麼好感。

哈代的純粹數學亦有這一類的社交功用。就在一九三一年，一位沒沒無名的印度小書記，名字叫做拉瑪紐強（Ramanujan），給哈代一封信，寫着一百道左右的數學學說。哈代請他同到英國，他在英國劍橋的三一學院，是第一位自印度來的研究員，後來還當選爲皇家學會會員。不幸的是他得了肺癆病，哈代去問候他的病時，他就撒手西逝了。他曾問過哈代租來的汽車號碼。哈代回答他：「一七二九，不是一個特別有興趣的數目。」「唉，」他接上去，「你沒有想到嗎？這是可以用兩種方法說明的最小的數目，就是兩個立方（十立方加九立方或十二立方加一立方）的總和。」像這類故事有的是。哈代堅定的宣稱，拉氏已同一萬以下的每一數目，成了最親熱的朋友了。

且不管哈代的這種態度，很多讀者會認爲不重要的，或甚至是反動的。哈代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是一個職工聯合會中的忠實份子，這些又是使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被戴上異教徒的帽子。我記得他曾在科學工作者全國聯合會（The 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發表一次激動的演說。這會到了一九二七，改名爲科學工作者協會（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他主張科學和數學所以值得研究的，是爲了科學和數學本身。但他接上去說，雖然我們的工作和煤礦工人相比，是大不相同，我們却需要更緊的靠攏煤礦工人，而不是資本家。至少，我們和礦工都是有技能的工作者，不會把旁人的工作排擠掉，如果有一條聯合陣線，他是和礦工在一起。

爲藝術而研究藝術，或爲數學而研究數學，這不是一種完美的思想。但這已比爲金錢而研究藝術，或爲工程而研究數學的動機，好得多了。無論如何，工程還是有用的。倘若你眞的信仰爲藝術而藝術，你很快會想要改革的，使得每一個人只要需要藝術，都能獲得一個機會，去學習藝術，去享受藝術。那意思就是大家都有必需的餘暇和財富，爲這樣一個社會而工作。事實上就是爲社會主義而工作。那些已是哈代盡力做到的。

再進一步，藝術家理解了他的藝術，能夠成爲社會主義的一種武器以後，必定盡善盡美的利用它。像威廉・摩理斯（William Morris），埃侖・勃區（Alan Bush）以及早期的蕭伯納，都達到了這個階段。當然，一個數學家要這樣做，是比較困難的，因爲數學僅能引起少數人的共鳴，而且要在社會主義獲勝之後，數學才能夠直接的被利用。

雖然我不贊同哈代的態度，我還是認爲只是一部分的錯誤，而不是整個的。這是對的，每一個有技能的工人，應該矜誇他的或她的工作，特別是這些工作並不爲了少數幾個人的利益。哈代化費了一生心血，着力在最簡便的材料，就是「純粹的數目」，創製了聰慧的工具。其他的人們，就利用了那些工具，去學習各種機械和生物，比如電話、和腦子。

從我自己的工作找一個例子，我剛在利用數目區分的學說，來分析家族中的某種疾病，平均說來，是不是後幾代要比以前幾代發生得多。有些人是熱中於數學美的，完全不談它的實用方面。我恰巧亦是那些人中之一。我深深明白，這是不夠的。但我亦認爲這些享受數學美的人們必定會更加喜歡，使得它臻於盡善盡美之境。

所以我不感覺得哈代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同時我哀悼這位先生，不但是我個人所敬愛的，而且別人從古典的音樂裏可以得到的許多感觸，現在從他的著作裏，亦給與我了。

（譯自一月九日Democratic & General News）